建道學刊 **54 (2020): 251-271**

十分材料十分話——
蘇精的十九世紀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黃文江
香港浸會大學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一 引言

>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七分證據，只可說七分話，不可說八分話，更不可說十分話。[1]

胡適（1891-1962）這番話講述做學問的基本要求，卻是知易行難。從來困擾學者的不是連一分證據都蒐集不到，而是容易墜進過度演繹七分證據的陷阱。十分證據背後需要十足材料來支撐，這意味着研究者必須具備勤奮及嚴謹的治學精神。文史學者埋首於圖書館及檔案館之中，力求把握每一分的證據。從其 1996 年的博士論文以來，蘇精（1946- ）的基督教史研究作品就正反映出這份堅持的態度。他從十九世

[1] 北京大學資訊管理系、台北胡適紀念館編：《胡適王重民先生往來書信集》（北京：國家圖書館，2009），頁568。

紀的歷史檔案下功夫，不論是英國政府外交部（Foreign Office）、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等部門的官式紀錄，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以至是英、美兩國不同的基督教傳教會檔案，他都細閱研究，又與不同的史料用心對照。因此，他熟識相關的歷史檔案，掌握宗卷和文件之間的從屬關係，對於手稿文字的書寫手法與行文風格更有一得之見。他的著作史料充實，從不人云亦云，做到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的境界。

蘇精的出版著作量十分豐富，本文只涉足他與中國基督教史研究有關的成果。有關十九世紀中國基督教史的專業論文有不少於四十二篇（詳見本文附錄一）；而與中國基督教史及華人教會史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專著有下列七本：《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2000，341 頁）、《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文化研究社，2005，320 頁）、《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文化研究社，2006，280 頁）、《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新竹：清華大學，2010，279 頁）、《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台北：台灣大學，2014，595 頁；北京：中華書局，2018，564 頁）、《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台北：斯福齋，2016，537 頁；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2017，537 頁）及《西醫來華十記》（台北：元華文創，2019；382 頁）。

二　專業發展的歷程

1972 年，蘇精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在學期間深受王振鵠 （1924-2019）的啟發、指導。[2] 蘇精的專業生涯一直與書有緣：從 1976 年至 1992 年的十六年間，他任職於中央圖書館，是一位專業的圖書館員。

[2] 王振鵠的學問及貢獻，詳見宋建成：〈王振鵠教授與台灣圖書館事業〉，《國家圖書館館刊》，2014年2期，頁181～192。

起先，他加入國際交換處工作；1981 年，中央圖書館向教育部提案成立「漢學研究資訊中心」，再獲行政院核准，由時任館長的王振鵠出任中心主任，蘇精出任聯絡組組長。這次師生合作建構了一個基地，把各地漢學研究的學者連繫起來。王教授於1977年從台灣師範大學借調至中央圖書館出任館長；而蘇精則在1981年至1988年間於中心工作，並着手籌辦《漢學研究通訊》以及後來的《漢學研究》，負責「研擬」通訊之出版以及日後的開展工作。[3] 論者指出這份通訊在台灣的意義重大：「開風氣之先，為人文學界最早發行的通訊報導類期刊之一。」[4] 不單如此，蘇精的工作使他對於華文學界以及海外漢學的趨勢有充分的掌握，拓展他對中國圖書以及背後的漢學研究的眼界。他對於古籍的鍾愛，可從其《近代藏書三十家》之中有所反映。[5] 1985年，他謙稱以「圖書館員的業餘之作」發表《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的成果，自資付梓出版。[6]

1992 年 6 月，是年他四十六歲，工作生涯的「下半場」才剛要開始。他毅然走出人生的安舒區，以破釜沈舟的決心，辭去中央圖書館的工作，遠赴英國的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英文系修讀「書目、出版史與校勘」的碩士課程。因應他對於印刷與出版的歷史的興趣，

---

[3] 〈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有關工作會議紀錄〉（1981 年 7 月 28 日）、〈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第一屆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1981 年 9 月 30 日），轉引自耿立羣：〈《漢研究通訊》：一百期回顧與分析〉，《漢學研究通訊》25:4 （總 100期）（2006年11月），頁52。

[4] 〈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有關工作會議紀錄〉（1981 年 7 月 28 日）、〈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第一屆指導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紀錄〉（1981 年 9 月 30 日），轉引自耿立羣：〈《漢研究通訊》：一百期回顧與分析〉，《漢學研究通訊》25:4（總 100 期）（2006 年 11 月），頁 52。

[5] 原版由台北的傳記文學出版社於 1983 年出版。2010 年，經由他增訂後由北京的中華書局出版。

[6] 2018 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增訂版。雖然初版的發行量不多，香港其中三所的大學圖書館仍有收藏此書。據世界圖書總目（World Catalogue），有三十所著名學府的圖書館亦藏有此書。詳見 <https://www.worldcat.org/title/qing-ji-tong-wen-guan-ji-qi-shi-sheng/oclc/1045005870&referer= brief_results>（2019 年 6 月 5 日下載）。

課程邀請了東亞研究學系講師韓德（Alan Hunter, 1953- ）[7] 指導他完成有關麥都思 （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 和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的研究，藉以探究近代中國印刷術發展的一些歷史問題。畢業後回台，他卻未能覓得合意的工作，遂再度赴英以「倫敦傳教會的中文印刷事業」為研究題目在倫敦大學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圖書館系修讀哲學博士，師從艾思東（Robin Carfrae Alston, 1933-2011）[8]。艾思東是活躍於歐美世界的書目學家、出版史家。1990 至 1998 年，艾思東除出任圖書館系教授之外，亦為「英國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English Studies） 開設「書籍史」的專題研究。修讀博士的三年間，蘇精全力以赴，完成五百多頁的博士論文，單計注腳及書目已近百頁之多。[9] 1996 年 12 月 8 日，他學成回台。在回程前一天的書函中，他寫道：「弟之學位論文 [題目從略]，已於日前口試通過，可謂僥倖。」[10] 「僥倖」一詞實屬過謙；他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學習生涯：「我在英倫各館 [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大英圖書館（British Library）、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圖書館、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圖書館、衛爾康醫學史基金會（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圖書館以及公共檔案館（Pubic Record Office）] 忙於抄錄檔案資料，不論雨雪，不知晨昏，

[7] 當時韓德研究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歷史，在這個階段他先後完成的重要著作包括：Alan Hunter and Don Rimmington, *All under Heaven: Chinese Tradition and Christian Lif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rk En Theologie in Context 17 (Kampen: J.H. Kok, 1992). 及 Alan Hunter and Chan Kim-Kwong, *Protestan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Studies in Ideology and Relig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8] David McKitterick, "Alston, Robin Carfrae (1933–2011), bibliographer and publisher,"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5 Jun. 2019), <https://www.oxforddnb.com/view/10.1093/ref:odnb/9780198614128.001.0001/odnb-9780198614128-e-104208> (accessed 6 June 2019).

[9] Ching Su, "The Printing Press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mong the Chinese,"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6).

[10] 〈蘇精致黃文江函〉，日期：1996 年 12 月 7 日。

有時甚至不覺飢寒，真是點滴心頭，歷歷猶在。」[11] 他對於印刷史的熱情，也可從他另一篇的學術論文有所反映。[12]

獲得博士學位之後，他返回台灣執教圖書館學以及印刷史有關的課程，曾擔任的崗位包括：南華大學出版學研究所副教授（1997 年 2 月至 1999 年 7 月）、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副教授、教授（1999 年 8 月至 2002 年 7 月）以及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教授（2002 年 8 月至 2004 年 2 月）。雖然他於 2004 年 2 月退休，但是他沒有停止其印刷史的研究。2007 年 8 月，他獲聘為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不久，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黃一農（1956- ）邀約他擔任「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研究計劃的研究員。從 2011 年 12 月至翌年 5 月，他抄錄近四十五萬字的美國長老會歷史檔案紀錄，為他日後開展有關長老會出版事業的研究奠定基礎。2012 年 9 月，是年六十六歲的他推卻所有職務，全心全意投入自己的研究工作，充分利用他積累下來的大量抄錄及整理的史料，完成不同的研究項目。2013 至 2018 年間，他接受來自台灣、日本、中國、香港等地不同大學及研究所的邀請，發表了共二十二次研討會的主題演講、特聘學人的學術報告。（詳見附表二）

三 十九世紀中國基督教史研究

蘇精出身於圖書館的專業，愛好古籍及圖書，繼而關注書籍背後的作者、出版、發行、收藏的故事。由於撰寫《近代藏書三十家》一書的關係，他注意到「書」的形態如何在近百多年經驗了重大的變化，其中「約略知道這種轉變和傳教士密切相關而已。」[13] 這可以說是他對於十九世

[11]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 台北：學生書局，2000年），頁V。

[12] 蘇精：〈谷騰堡與搖籃本古書〉，《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21期 （1995年4月），頁26～43。

[13] 〈自序〉，《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年），頁 xiii。

紀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產生了興趣的一個起點。及後，他對於清末同文館的歷史尤感興趣，完成了《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一書。書中除了提及個別傳教士，如：德貞（John Dudgeon, 1837-1901）等之外，最後一章論及的黃勝（1825-1902），其人生與基督教有莫大的關係。正如蘇精所說：「黃勝是基督徒，退休後直到七十歲還登台講道」。[14] 對黃勝一生起了關鍵影響的倫敦傳道會，也湊巧成為蘇精日後研究十九世紀中國基督教史的關鍵。

上文提及蘇精踏上研究院之路的歷程，現不贅言。他以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作為研究中國基督教史的起點，首本專著《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其中不少的重要觀點乃是建基於其十分堅實的博士論文，例如：博士論文中的第四章發展成是書之中的〈十九世紀中葉的倫敦傳教會上海站〉以及〈從英華書院到中華印務總局〉。是書的要旨是從研究出版史的專業角度出發，分析十九世紀中國為何出現由西方的鉛印和石印技術取代了傳統木刻的現象，並探討基督教傳教士如何承擔了「西方印刷術引介者的角色，以及他們和中國人之間的互動關係。」[15] 全書共由十三篇專業論文組成，既是出版史也是在華傳教士以印刷為傳教媒介的深入研究。中國思想史專家周啟榮（1951- ）評論此書時指出：「作者在研究傳教士如何介紹及傳播西方印刷術方面所掌握的有關檔案文獻及中、英文學術專著，可以說是罕見的。著者大量利用收藏在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大英圖書館，及其他傳教檔案機構的文獻。尤其難得的是作者對馬禮遜出版的傳教書籍，單章進行分析，增補了現存對馬禮遜中文刊物研究的不足……這是一部研究中國近代史、基督教在華傳播史，與及中國文化史必讀的佳作。」[16]

---

[14] 《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頁266。

[15] 《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 iii。

[16] 周啟榮：〈評蘇精著《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 4 期（2001 年），頁 147。

從 1994 年始，蘇精一直研究馬禮遜在華的傳教事業。因應博士學位論文的論旨以及日後在圖書館學及出版研究範疇的教學工作，他把焦點放在馬禮遜的中文印刷和出版事業。及至 2004 年退休，他逐步把其研究及撰作擴闊至馬禮遜在華的其他方面。2005 年出版的《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就是這個方向的全面的成果。是書由十二篇專業論文組成，分為三個部分：馬禮遜不同階段的生命歷程、馬禮遜的親友，以及馬禮遜栽培的四位華人信徒。一如以往，是書各篇均以十分扎實的史料為本，修正了有關馬禮遜研究的一些錯誤，亦為日後學者開拓新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礎。以下兩個例子可作說明：翻譯史學者王宏志（1956- ）在其〈「我會穿上綴有英國皇家領扣的副領事服」：馬禮遜的政治翻譯活動〉的論文之中，[17] 其中涉及馬禮遜與斯當東（George T. Staunton, 1781-1859）的交誼以及馬禮遜的經濟狀況等關鍵問題，就是依據蘇精書中的〈馬禮遜與斯當東的情誼〉以及〈福音與錢財〉兩篇論文。在一篇研究馬禮遜的中文教學著作及其影響的論文中，論者以蘇精書中〈馬禮遜的中文教學〉一文為據，並指出：「蘇精先生研究馬禮遜擔任廣州商館『中文教師』期間的教學活動，該文善用倫敦會及馬禮遜個人通信日誌等一手史料，進一步解釋廣州商館中文班的上課情形、董事會的態度與獎勵措施、董事會與商館對馬禮遜中文教學的立場差異等。」[18]

於 2006 年 12 月出版的《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可以視作《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的姊妹篇。全書收有十篇論文，包含了十九世紀中國基督教史的不同層面：有討論記述鴉片戰爭前後二十年的《中華叢論》（*The Chinese Repository*）、從郭實臘（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黃寬（1829-1878）、洪仁玕（1822-1864）三個不同的個案看傳教士之間的互動與矛盾、女子學校的困難、從考場分書和派送新約聖經的挑戰看文字宣教之問題、鈎沉美

[17] 王宏志：〈「我會穿上綴有英國皇家領扣的副領事服」：馬禮遜的政治翻譯活動〉，《編譯論叢》，第三卷，第 1 期（2010 年 3 月），頁 1 ～ 40。

[18] 游博清：〈漢言津梁：馬禮遜的中文教學著作及其影響〉，《興大歷史學報》第 30 期（2016 年 6 月），頁 55。

國早年華人史的佚史和評論《馬禮遜回憶錄》的誤譯等。這書為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在史料學上的起到示範作用。在他的序言中，他談及了史料以及研究態度兩方面的問題，意味深長，值得深思。

說到史料，蘇精至今唯一整理、編輯、出版的就是《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澳門新聞紙》的原文與譯文》。撰寫《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之〈林則徐的翻譯梁進德〉一文引起了他對於林則徐及《澳門新聞紙》的注意。該篇章旨在從大量的史料之中梳理出梁進德（1820-1862）的成長歷程、他與林則徐的工作關係、以及他與傳教士之間的關係等問題。至於他的歷史地位如何，蘇精指出：「在中國近代化萌芽的初期，梁進德的確發揮過作用的。」[19] 也許，他對這樣的答案也不太滿意。2004 年前後，他已經留意《澳門新聞紙》、〈華事夷言〉；他也閱讀《廣州記事報》（*The Canton Register*）、《廣州新聞報》（*The Canton Press*）以及《新加坡自由報》（*The Singapore Free Press*）三份資料，經四年的功夫，把《澳門新聞紙》、〈華事夷言〉的原文與中文譯本比較、對照，還原原貌，整理出 487 頁的對照。其他論者定當可以此從更多的角度去探究梁進德發揮過甚麼作用。不可忽略的是蘇精為是書寫了五十頁的〈導論〉，詳情說明這份資料的來龍去脈，考訂出林永俁（1914-2002）以及施其樂（Carl T. Smith, 1918-2008）研究的錯誤，恢復林則徐譯者的原來面貌，包括與傳教士關係密切的袁德輝和梁進德。是文更解答三個翻譯必須面對的疑難：翻譯甚麼、如何翻譯、翻譯是否恰當。《林則徐看見的世界》提供十分材料，有待其他研究鴉片戰爭前夕中英關係的學者以及十九世紀英漢翻譯史家以此說出他們的十分話。

2010 年，蘇精出版《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從 1994 年他開始研究倫敦傳教會的中文印刷事業，十九世紀初傳教士如何在東南亞一帶發展向中國傳教的工作是他博士研究的重點之一。1994 年 11 月初，他開始從這方面下功夫。他的函件如是說：

---

[19] 《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頁 220。

> 目前繼續努力下一章〈倫敦傳道會在南洋〉，因重閱馬六甲等地之檔案，收獲頗大，瞭解亦較深，蓋在Leeds時，因時間既短，課業又重，數度抽空至倫敦抄寫檔案，所得實屬有限，當時僅集中於上海一地，如今仔細閱讀巴達維亞檔案，恍然大悟欲瞭解1860年以前倫敦傳道會在上海之活動，則需先瞭解在巴達維亞之活動，因兩處均以麥都思為主角，而麥氏對傳教於華人有其獨特之想法與方法，與馬禮遜及米憐有絕大差異。再如弟原對馬六甲英華書院不甚了了，雖讀Brian Harrison之*Waiting for China* 總覺隔靴搔癢差一層，如今因得從容閱讀檔案而直接瞭解箇中詳情，頗為痛快，將來或可以此為題寫篇中文論文。[20]

事實上，這是過去從事中國基督教史的學者所不多注意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奠基階段。他的博士論文第三章談及倫敦傳教會在東南亞的發展，該章共有 136 頁，佔博士論文的三分之一的份量，「新加坡」在他的博士論文出現了近 180 次。在同一封的函件中，他又指出：

> 十餘年前，新加坡及馬來亞學者一度對1820年代LMS (編按：即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在新之傳教士 C.H. Thomsen 大為推崇，因其人為新加坡印刷第一人，為當地馬來文印刷之鼻祖，後經西方學者撰文指證 （即根據LMS檔案） 其人格之不堪為傳教士，對他種種溢美之詞才告停止，此因新馬學者係以英文撰文，故不久即引來行家指正，雖然尷尬，從另一角度而言，則提高當地學術水準，錯誤不致延續。遺憾者中文關於初期基督教在華之研究，迄今未引起西方學界重視或批判，係水準不夠或語言因素、或兩者皆是，值得深思，但無論如何，閉門造車，絕非是福。[21]

翌年的 1 月 12 日，他的另一封函件進一步地說：「目前弟仍研讀南洋資料，閱讀倫敦會與屬地各站及其印刷品比較始末，雖已大概瞭解，然閱南洋華人與屬地於今之背景與發展，仍有待努力深入，何時下筆尚

---

[20] 〈蘇精致黃文江函〉，日期：1994年11月2日。

[21] 〈蘇精致黃文江函〉，日期：1994 年 11 月 2 日。

未定之，言之恐過早也。」[22] 有了這樣的背景，他順理成章轉向研究新加坡的華人教會史。除了學問上的基礎，其中涉及也是一份情、一份感動、一份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在是書的序言他寫道：

> 我所以會撰寫本書，緣於2007年新加坡基督教界為紀念華人傳教事業兩百週年，接受當地的學術同道莊欽永博士推薦，邀我前往以「馬禮遜與新加坡」為題演講。那年8月18日下午我在聖安德烈座堂報告，台下兩百餘名聽眾的神情與提問，似乎顯示了他們亟於想知道，第一位向華人傳播福音的馬禮遜和新加坡究竟有甚麼樣的關係。聽眾們專注而熱切的神情讓我深受感動，正好我在準備講詞的過程中，也體會到的確缺乏新加坡基督教初期歷史的學術性論著，於是這樣的感動與體會結合在一起，就促成我許下心願，撰寫一部新加坡基督教初期的史書，藉以回報聽眾的熱忱，並填補歷史的一段空白。[23]

在撰寫此書，不難發現的是他一如以往的把持「十分材料說十分話」的精神，他如是的紀錄：

> 我決定持續自己研究十九世紀中國基督教史的一貫做法，從蒐集和研讀原始史料的基礎工夫着手，於是以七個多月時間，整理當年在新加坡設立佈道站的四個英美傳教會相關檔案，獨自一人承擔影印縮微資料、辨讀手寫字跡及鍵入電腦等工作。其間曾因故扭傷腰椎，壓迫到神經，坐臥難安兩個月左右，還得藉着辨讀字跡以求分心減輕痛苦，如此雖然相當辛苦吃力，但心願不經一些考驗不易實現，結果竟完成約八十餘萬字的史料建置，成為本書敘事、分析與立論的最重要憑據。[24]

---

[22] 〈蘇精致黃文江函〉，日期：1995年1月12日。

[23] 《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頁 vi。

[24] 《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頁 vi。。

中國基督教史專家查時傑（1943- ）評價此書：「全書在詮釋、解釋與爬梳基督新教東來傳教最初階段（1819-1846）史實有其貢獻與價值，詳細精讀之後，的確可讓讀者對這段歷史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25]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是一本近六百頁的鉅著，背後的是三十年來的研究，抄錄海量之檔案已超過三百萬字。是書的研究範圍從其博士論文分析的倫敦傳教會擴展至美國長老會的中文印刷業、澳門華英校書房、寧波華花聖經書房及其遷往上海的發展，以及姜別利（William Gamble, 1830-1886）與上海美華書館的關係。這書分析了十九世紀中國現代印刷術發展的每一個關鍵環節。在書的自序之中，他說明了其撰述的歷程：

> 從2010年的年中開始，本書的寫作經過約三年半才得以完成，其中的前兩年我還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中心擔任約聘研究員，承蒙中心主任黃一農院士提供優越的環境讓我得以專心研究和寫作，同時人社中心亞洲季風計畫歷史組召集人徐光台教授也經常關注我的研究情況，都讓我由衷感念。近一年多來，我離開了清華人社中心在家寫作，期間曾應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高晞教授與鄒振環教授之邀，在2013年5月前往復旦進行相關的學術報告與交流，並實地探訪了當年長老會美華書館的幾處舊址，又承上海出版博物館林麗成館長邀約，與高晞教授、鄒振環教授、馮錦榮教授，及高明博士等，前往寧波考察長老會華花聖經書房與佈道站等舊址，藉與書面史料互相印證，實在是收穫豐富的一趟學術之旅。[26]

有關此書的價值，在鄒振環（1957-）的書評中有三個要點值得注意。首先，論者從蘇精成為學者的歷程說起：

---

[25] 查時傑：〈評《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漢學研究》29 卷 1 期（2011 年 3 月），頁 326。

[26]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頁 XV。

> 蘇精早年在圖書館積累了豐富的圖書目錄學的知識，後又系統接受過西方印刷史和書籍史的訓練，並積累了深厚的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知識。正是因為有這些重要的學術準備，才能使作者在《鑄以代刻》這一精細之作中，為我們勾勒出西方印刷術自西徂東和活字印刷技術由南而北轉移的清晰圖像。[27]

其次，論者評論他應用「十分材料說十分話」的方法所起的作用：

> 《鑄以代刻》……據第一手資料——傳教士的手稿檔案完成……透過對大量資料之爬梳，發掘許多鮮為人知的印刷機構的歷史、印工的故事，探討了傳教士的印刷與鑄字工作。檔案言說的主要功效，就是能夠對很多史實作出較之前人更精細的結論和更準確的判斷。[28]

正因如此，蘇精修正下列重要著作的一些錯誤，如：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的《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回憶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麥金托什（Gilbert McIntosh, 1897-1967）的《在華傳教會印書館》（*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蘭寧（G. Lanning, 1852-1920）和庫壽齡（S. Couling, 1859-1922）的《上海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以及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 1954-）的《古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等。[29] 另一篇書評亦提出了是書三方面的貢獻。其一、「修正或重建了較多史實，使西方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進一步清晰」；其二、「部分華人印刷工匠的輪廓得以浮出水面，豐富了中國印刷出版史的書寫」；其三、「追尋了文本、活字在中國社會的流通與接受，為後續研究提供了線索」。論者進一步說：

---

[27] 鄒振環：〈中國圖書出版的「典範轉移」——讀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清華學報》45卷1期（2015 / 03 / 01），頁153。

[28] 鄒振環：〈中國圖書出版的「典範轉移」〉，頁 155。

[29] 詳情，參鄒振環：〈中國圖書出版的「典範轉移」〉，頁 158 ～ 160。

> 今天的歷史學，理論與敘事深深糾纏，似乎每一部歷史學作品都逃不過追問。模式固然重要，理論也是急需。然而，從錯綜複雜的、艱難獲取的史料中理出一個又一個基本的史實，仍是歷史學家最重要的事功。在這個意義上，儘管本書未涉理論，但所採史料均為一手，且運用嫻熟，敘事細密，翔實可靠地呈現了 19 世紀初到 70 年代期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引介西方活字革新中文印刷的歷史過程，是一部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力作。[30]

2019年出版的《西醫來華十記》是他最新近的著作，書中共有十章，其中與基督教史有直接關係的有八篇：〈傳教與醫學：伯駕與新加坡華人〉、〈上海仁濟醫院的創辦人雒頡〉、〈合信《全體新論》的生產與初期傳播〉、〈黃寬的醫學生涯與中西文化夾縫〉、〈上海第一位中國人西醫黃春甫〉、〈廣州女傳教醫生賴馬西與明心書院〉、〈笪達文與仁濟醫院〉以及〈學習西醫的中國學徒〉。這書的緣起都與之前的研究有傳承關係。他的序言有以下的記述：

> 原來，二十多年來我關注以基督教傳教士為中心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他們在印刷出版、翻譯和學校教育方面的各種活動，我因此抄錄了頗多傳教士的相關檔案作為基本的史料，也旁及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由於醫療工作和印刷出版、學校教育都是傳教士輔助傳教的重要工具，所以我在抄錄的過程中，經常會見到有關他們醫學活動的記載，覺得很有意思，尤其遇到以往的論者不知或可以糾正前說錯誤的史料，實在捨不得棄而不顧，而且傳教士檔案數量龐大，汗牛充棟都不足以形容，一旦放過這些有意思而珍貴的史料，回頭再找極不容易，於是就順便抄錄下來，日積月累的結果數量不少，只因自己另有更為關注的印刷出版等課題而擱置未用。[31]

此書的寫法、重點以及不足之處，他在序言之中有言明：

---

[30] 卞冬磊：〈古騰堡的人馬在19世紀的中國：深描和隱喻——評《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新聞學研究》123期（2015 / 04 / 01），頁 271～280。

[31] 《西醫來華十記》（台北：元華文創股份，2019），頁 i。

> 本書的十篇文章，都是十九至二十世紀初年西醫來華過程中相關的人與事。由於基督教的傳教醫生（即醫藥傳教士）是在華傳播西醫人數最多、作用也最大的羣體，同時我抄錄的史料本來就以他們的檔案為主，所以十記中多的是傳教醫生的活動，但本書也涉及東印度公司的醫生和海關醫生。除了這些傳教、公司與海關等三種外國醫生的活動以外，我深深感到興趣的是中國人的反應如何，對此我嘗試兩種寫法：一是記載十九世紀學習西醫的中國人，包含到愛丁堡求學的黃寬、在上海擔任學徒的黃春甫，以及一些學徒出身的中國西醫，希望能瞭解他們習醫經過、學成後的生涯，和面臨的各種難題；另一種寫法是在記載外國西醫的活動中，儘量留意當時的中國人對西醫的態度與行為，儘管這些態度與行為大多只能從外國西醫的記載中得知，但多少應該還能反映出中國人對西醫的觀感。只是，雖然我希望能同時從施與受雙方的視角，觀照西醫來華過程中人與事交織而成的各種現象與意涵，但自己是醫學史外行，沒有能力進行比較全面而深入的論述，也沒有預先系統性規劃各篇的主題，只能就我經眼和抄錄的檔案中，隨機而籠統雜記自己覺得有意思的人與事，但求這十記近於實記，則於願已足。[32]

雖如序言所指出本書沒有系統性規劃各篇的主題，但這書的價值毋庸置疑。他以其一貫尋找「十分材料」的驚人魄力，建構出「十分話」的歷史。全書的第十章尤其珍貴，因為在茫茫無際的史料之中，他找來從不擔當英雄或是主角地位的醫療學徒，填補了不少不為人知的空白，豐富了近代中國醫療史的論述。他起到的示範作用，有助尋求更豐富的歷史論述的可能性。在文章的末後，他勉勵同行與後進說：「在傳教士檔案中還有更多同樣的史料等待耙梳整理……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能深入傳教醫生的檔案，耐心發掘整理出更多西醫學徒的史料。」[33]

---

[32] 《西醫來華十記》，頁ii。

[33] 《西醫來華十記》，頁 366。

四 結語：與我亦師亦友的蘇精

筆走至此，我順道說明一下蘇精對我的啟發，他是我的良師益友。1994 年 4 月，我誠惶誠恐地參加第一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當時得陳劍光（1958- ）的推薦，里茲大學宗教與神學系邀請我參加中國佛教史的研討會（Chinese Buddhism: Texts and Contexts）。當時，陳劍光和韓德正一起進行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的研究，他們之間彼此十分熟絡。因此，韓德熱情地接待，又介紹我認識蘇精。里茲大學的學術會議後，我便前往亞非學院進行短期訪問，在亞非學院的圖書館第一次見到蘇精。大概因為是韓德的介紹，蘇精十分樂意指點我使用有關倫敦傳道會的歷史檔案。事實上，我曾於 1992 年的夏天到訪亞非學院圖書館，使用過有關的歷史檔案。蘇精見我並非新手，我們的確有很多可交流的地方。我在亞非學院的圖書館以及大英圖書館留了不到二十天的時間，之後再前往牛津大學的圖書館。其間，我們常在圖書館內指定的閱覽室仔細研究有關的檔案，有時共同研究傳教士筆法／書法的差異，有時一起推敲檔案所載委婉修辭背後真正的意思，很有同道不孤的感受，頗能鼓舞研讀博士的士氣。

我由衷地佩服他抱着破釜沈舟的決心，在四十多歲的時候轉換人生的跑道。我知道他是一名很有人生智慧的學者，超乎我想像的是他沒有小看我年輕，一直對我很是鼓勵，視我如同輩、同道、同學一般。及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絡，互通研究的想法。他寫給我的信函，我都好好保存，因為其中往往記錄了研究的線索。他其中一道的早期書函，對我影響很大，經常提醒自己。他寫道：

> 弟涉入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之研究為時甚淺，並僅以初期之五十年為主要範圍，故於問題之闡釋尚難有如何之發明，卻有幸開始不久即直接以第一手史料與圖書為憑證，因此於史實之把握自信不至太差，且以自身並非教徒，而無通常由於信仰所致之主觀，於是對歷來以中文寫作關於初期基督教在華傳教史之論著中，屢見不鮮之失誤偏頗、甚至顛倒史實情形大感詫異，更由於此等論著迄今仍繼續增加中，積非成是，誤導後學，弟不

> 免為以中文作初期基督教在華歷史之研究前景擔憂。關於1840年以前之研究，無可諱言必以西方資料為主要根據，如不能利用直接史料，退求其次引用西方學者既有之研究成果亦屬無可厚非，但若囫圇吞棗、不求其解，已是可笑，最不可原諒者則為曲解人意而穿鑿附會，大加申論，貽害學子甚大，弟當初亦由此等論著啟蒙，接觸西方資料後乃知其謬，故吾兄於指導學生寫作此一主題之論文時，盼多提醒學生明辨，如有需要，弟可舉出若干實例供吾兄教學之用。[34]

及後，我進入大學工作，擔任教學、研究以及行政等不同的任務。有時工作頗多之時，心中難免冒出一些僥倖心態，在教學及研究上容易掉入張冠李戴的陷阱。每每想起蘇精投入學術界的決心以及其嚴格的治學態度，我便精神抖擻，繼續振作。畢竟，「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才是正確的道路。

撮　要

本文介紹蘇精從事學術研究的歷程、治學方法以及成就。在其高級學位的研究論文，他疏理出倫敦傳道會在東南亞以及中國的出版事業，對於主要的傳教士、華人同工與信徒等均有深入的了解。及後，他的研究拓展到其他來華的基督教差會，又把眼光轉移至傳教士在不同領域的工作，如：傳道、教育、醫療、翻譯與編輯等。他的研究加深了學者對十九世紀中國基督教史的認識。他以嚴謹態度治史，啟發後學注意教會史的史料學，修正了前人論述上的不足，貢獻顯著。

ABSTRACT

This article gives an account of Su Ching's scholarship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his higher degree theses, Su Ching writes a thick nar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printing press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its China mission, which also covers the lives and times of leading missionaries as well

[34] 〈蘇精致黃文江函〉，日期：1994年11月2日。

as Chinese co-workers and converts. Subsequently, he expands his research scope to include other missionary societ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such as church ministry, education, medicine, as well as translating and editing. His studies provide substances for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the 19th century. He is meticulous in his use of historical sources so that he makes revisions to some false opinions in the fiel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is field of study are significant.

附錄一：蘇精發表與有關十九世紀基督教史研究的論文（1996 年以來）［截至 2019 年 6 月］

1. 〈馬禮遜翻譯出版三事〉，《新聞出版博物館》2018:2（2018.11），頁 4 ～ 11。
2. 〈合信《全體新論》的出版與初期傳播〉，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藥品、疾病與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 193 ～ 116。
3. 〈贊助或不贊助——倫敦傳教會和馬禮遜的互動〉，《翻譯史研究》2017（2017.12），頁 84 ～ 96。
4. 〈上海美華書館遷至北京路 18 號始末〉，《新聞出版博物館》2017:1（2017.7），頁 4 ～ 13。
5. 'Missionary Society Archives and Research on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8 (2017.3): 3-16.
6. 〈《依涇雜說》的虛與實〉，《新聞出版博物館》2016:2（2016.12），頁 102 ～ 104。
8. 〈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出版的曲折歷程〉，《中國出版史研究》2016:3（2016.7），頁 8 ～ 20。
9. 〈鴉片戰爭前中文報刊三考〉，《新聞出版博物館》2016:1（2016.7），頁 89 ～ 99。
10. 〈《澳門新聞紙》的版本、底本、譯者與翻譯〉，《翻譯史研究》2015（2015.12），頁 99 ～ 144。

11. 〈第一部鑄版印的中文書：《救世主坐山教訓》〉，《新聞出版博物館》2015:2（2015.10），頁 92 ～ 99。
12. 〈南京圖書館藏《澳門新聞紙考訂》〉，《新世紀圖書館》2015:4（2015.4），頁 82 ～ 85。
13. 〈《千里鏡》── 鴉片戰爭後的第一種中文報刊〉，《新聞出版博物館》2015:1（2015.4），頁 42 ～ 51。
14. 〈銅臭不掩書香 ─ 英國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的圖書館〉，王振鵠教授九秩榮慶籌備小組編，《王振鵠教授九秩榮慶論文集》（台北：師大書苑，2014），頁 95 ～ 108。
15. 〈墨海書館與美華書館的印刷機〉，《新聞出版博物館》2014:1（2014.8），頁 91 ～ 99。
16. 〈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與印刷出版〉《出版博物館》2013:3（2013.9），頁 42-47；2013:4（2013.12），頁 4-10。
17. 〈中文聖經第一次修訂與爭議〉，《編譯論叢》5:1（2012.3），頁 1 ～ 41。
18. 〈裨治文在十三行 1830-1833〉，趙春晨、冷東編，《廣州十三行與清代中外關係》（廣州：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頁 385-405。
19. 〈初期的墨海書館 1843-1847〉，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上海:上海人民，2011）頁 153 ～ 180。
20. 〈新加坡堅夏書院：十九世紀前期西學輸入的先鋒〉，桑兵、趙立彬編，《轉型中的近代中國：近代中國的知識與制度轉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0），頁 23 ～ 48。
21. 〈英國東印度公司與西醫來華〉，珠海市委宣傳部、澳門基金會、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編，《珠海、澳門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屆珠澳文化論壇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0），頁 44 ～ 76。
22. 〈馬禮遜與英華書院的經費〉，李金強等主編：《自西徂東：基督教來華二百年論集》（香港：基督教文藝，2009），頁 31 ～ 51。
23. 〈馬禮遜史料舉隅〉，《國際漢學》第 16 輯（2007.12），頁 113 ～ 123。
24. 〈馬禮遜的南洋之行〉，《國際漢學》第 16 輯（2007.12），頁 124 ～ 140。

25.〈馬禮遜與英華書院的經費〉，李金強等編：《自西徂東 ——基督教來華二百年論集》（香港：基督教文藝，2009），頁 31 ～ 51。
26.〈評鄧譯馬禮遜回憶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8（2007/2008），頁 108 ～ 111。
27.〈中華叢論（*The Chinese Repository*）的生與死〉，《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7（2006/2007），頁 19 ～ 34。
28.〈評顧譯馬禮遜回憶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6（2004 / 2005），頁 96 ～ 98。
29.〈馬禮遜與斯當東：英國兩位初期漢學家的情誼〉，《台灣師大歷史學報》30（2002.6），頁 79 ～ 94。
30.〈黃寬與倫敦傳教會〉，《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3（2000），頁 21 ～ 30。
31.〈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部與我〉，收在《基督教在華發展史文獻部十週年紀念特刊（1996-2006）》（香港：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2006），頁 22 ～ 25。
32.〈清末基督教傳教士的考場分書活動〉，收在磯部彰編，《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Studies of Publishing Culture in East Asia*）（東京：知泉書館，2004），頁 105 ～ 116。
33.〈馬禮遜的中文教學：英國漢學建制化的先聲〉，收在《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斗六：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2002.11），頁 185 ～ 197。
34.〈百萬新約送中國：一項未完成的出版計劃〉，收在《出版與圖書館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系，2002.4），頁 108 ～ 116。
35.〈西方印刷術傳入中國的經過與影響〉（日文：宮紀子譯），收在狹間直樹編，《西洋近代文明與中華世界》（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1），頁 312 ～ 330。
36.〈從英華書院到中華印務總局〉，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頁 299 ～ 312。

37.〈王韜的基督教洗禮〉，林啟彥、黃文江主編：《王韜與近代世界》（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0），頁 435 ～ 452。
38.〈文本與意象：印刷出版在阿美士德號事件中的角色〉，《佛光學刊》2（1999.11），頁 285 ～ 298。
39.〈基督教傳教士與中文活字印刷〉，《圖書與資訊學》22（1997.8），頁 1 ～ 9。
40.〈王韜的基督教洗禮〉，《歷史與文化》1（1998.1），頁 59 ～ 67。
41.〈基督教傳教士與中文活字印刷〉，《圖書與資訊學》22（1997.8），頁 1 ～ 9。
42.〈中文石印，1825-1873〉，《書目季刊》29:3（1995.12），頁 3 ～ 13。
43.〈近代第一種中文雜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書目季刊》29:1（1995.6），3 ～ 12.

附錄二：2013 年以來蘇精出席中國、日本、香港等地有關十九世紀基督教史研究的演講邀請［截至 2019 年 6 月］

日 期	講 題	場 所	主 辦 者
2018.10.26 武漢	清末傳教士檔案 的史料價值	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2018.10.25 武漢	傳教士學習 中國語文的史料	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2018.10.12 香港	馬禮遜與英華書院	中西文化交流與基督教 在華發展史： 英華書院創校兩百年學 術會議主題演講	香港浸會大學 中華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與英華書院
2018.9.1 東京	美華書館二號（柏林） 活字的起源與發展	東京印刷博物館 東亞細亞漢字書體： 現在與未來研討會	日中韓活字研討會實行 委員會
2018.5.7 上海	仁濟醫院 的創辦人雒頡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附屬仁濟醫院第二屆 院史論壇	仁濟醫院

日 期	講 題	場 所	主 辦 者
2018.4.20 大阪	關於羅伯聃的 「新」史料	2018年度東西學術研究 所第一回研究例會	日本關西大學 東西學術研究所
2017.12.20 上海	從檔案看姜別利活字 的四個問題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 字體工作室成立儀式	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 字體工作室
2017.12.18 廣州	廣州女傳教士賴馬西 與明心書院	暨南大學 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暨南大學 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2017.12.18 廣州	馬禮遜回憶錄 英文原本的問題	暨南大學 研究生課	暨南大學中國 文化史籍研究所
2017.6.7 台北	基督教傳教士檔案 的史料價值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2017.3.27 上海	笪達文與仁濟醫院	上海交通大學 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 第一屆院史論壇	仁濟醫院
2016.12.16 廣州	傳教士檔案中的 印刷出版史料	暨南大學	暨南大學 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2016.12.15 廣州	傳教士檔案中的 醫學史料	暨南大學	暨南大學 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
2016.10.20 上海	林則徐《澳門新聞 紙》的真相	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歷史系
2016.9.28 香港	馬禮遜在東印度公司 的翻譯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翻譯系
2016.9.29 香港	基督教傳教士檔案中 的翻譯史料	香港中文大學 研究生座談會	香港中文大學 翻譯系
2016.5.7 大阪	基督教傳教士檔案與中 西文化交流研究	關西大學 第八屆東亞文化交涉學 會基調演講	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第八 屆大會籌備委員會
2016.4.25 台北	基督教傳教士檔案中 的教育史料	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系
2013.5.14 上海	基督教傳教會檔案中 的印刷出版史料	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 歷史系
2013.5.16 上海	姜別利與美華書館	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 歷史系
2013.5.21 上海	基督教傳教會檔案中 的醫學史料	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 歷史系
2013.5.22 上海	雒頡與上海仁濟醫館	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 歷史系